

疫情背景下的政府稳定性： 以中东欧国家为例*

鞠 豪 苗婷婷

【内容提要】 政府稳定性是各国政治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政治学研究的热门议题。过往的研究更多描绘的是各国政府在常规状态下的执政状况，所依赖的解释变量也是其政治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般性因素。新冠疫情的出现意味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进入一种非常规状态，也对其政府稳定性提出了全新的考验。本文以中东欧国家为案例，从疫情、联合政府类型与民粹主义政党三个关键性因素出发，对其政府稳定性与政府更替情况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是：政府稳定性较低、政府更替频繁是中东欧国家在2021年的主要政治特征。新冠疫情直接削弱了各国政府的执政基础；面对疫情的冲击，在议会民主制模式下盛行的联合政府变得极为脆弱；新一批民粹主义政党尚未适应政党政治的规则与运作模式，对政府稳定性的挑战大于贡献。在疫情背景下，各国政府与执政党都将经受更多的考验。

【关键词】 政治稳定 政府稳定性 中东欧 政党 民粹主义

【作者简介】 鞠豪，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苗婷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一 问题的提出

政府稳定性是各国政治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政治学研究中的热门议题。在议会制民主模式下，两党或多党竞争的态势、定期举行的选举与政党本身的分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多速欧洲与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进程研究”（18CGJ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化组合既代表了更多的政治不确定性，也意味着政府更替的风险大为增加。因此，对政府稳定性与政府更替的研究常常集中于以议会民主制为政体的欧洲国家。从政治体制、政党政治环境与政府执政表现等不同角度出发，学者们对政府稳定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索，也就如何阐释一国政府稳定性状况与政府更替的原因达成了初步的共识。然而，过往的研究更多描绘的是各国政府在常规状态下的执政状况，所依赖的解释变量也是各国政治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般性因素。从 2020 年年初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不仅对各国民众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也使得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陷入到停滞或时断时续的过程中。这样一种非常规的状态是各国政府未曾体验过的，也未被过往的研究所触及。面对百年难遇的疫情，各国政府稳定性和政府更替的情况究竟如何？这一问题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也因此成为本文的研究主题。

为探索这一主题，我们选取了中东欧国家作为研究案例。首先，政府稳定性一直是这些国家政治转型中的重大问题。在东欧剧变后，中东欧国家陆续开启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其中，仿照西欧国家建立多党竞争的议会制民主成为其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伴随着议会制民主的确立与发展，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进程也进入到新阶段。纵观过去的 30 年，中东欧政治由混乱走向有序，政党规模趋于稳定，左右翼政党轮流上台执政成为各国的政治主线。同时，激烈的政党斗争使得政府稳定性降低、政府更替相对频繁成为中东欧国家的重要政治特征。其次，在政治学研究中，对政府稳定性的研究是一个相对成熟的领域，也催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但因为中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要晚于西欧国家与其他转型国家，专门针对这些国家政府稳定性的研究仍然相对薄弱，也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的时间范围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有鉴于此，我们将综合考虑过往研究的成果与当前中东欧国家的现实背景，对 2021 年中东欧国家的政府稳定性和政府更替状况进行全面分析。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们将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总结过往研究的优点与不足。以此为基础，我们将在第三部分提出本文的研究构架。在第四部分，我们将结合政府更替频次、政府执政时间、政府类型与政府结束方式等与政府稳定性相关的评估指标对 2021 年中东欧国家的政府稳定性与政府更替情况进行初步总结。随后，我们将转入对中东欧国家政府稳定性较低的原因分析以及各国政府更替的过程性分析，力求回溯和阐释中东欧国家的政府由上台执政到发生更替的真实过程，及其各种关键性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的实际影响与影响方式。

二 理论背景

按照牛津大辞典的解释，所谓稳定，指的是一种不会被任何方式改变、移动或干扰的状态^①。这一定义符合我们对稳定一词的一般性认知，主要强调稳定的秩序型内涵与静态属性。但在政治学的研究范畴中，学者们更多将稳定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广义上的政治稳定，是指一定社会的政治系统保持动态的有序性和相对连续性。这种稳定并不意味着政治系统各要素没有变化，而是指政治系统内部的主要成分，如基本政治价值、政治文化、基本政治制度或宪政结构比较持续或比较平缓的变化^②。更进一步地说，政治稳定可以理解为政治体系不断协调内部要素，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和情感诉求，逐渐与周围环境实现良好互动的过程^③。

虽然学者有意增加政治稳定的持续性内涵与动态属性，但这一概念的边界依然是十分模糊和抽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出现高潮，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大量涌现。这些国家的民主转型与发展状况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也推动了比较政治学的流行。然而，一个模糊而抽象的政治稳定概念既无法准确描述一国的政治发展状况，也难以帮助我们对不同国家的政治稳定性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此同时，行为主义研究范式开始大行其道，各种政治概念的学理性内涵逐渐被淡化，而概念的可测量性与可操作性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以更好地融合现代定量分析。受此影响，对政治稳定概念和内涵的辨析让位于对政治稳定的操作化，而对一国政治稳定性的宏观把握与分析也逐渐下沉到中观与微观层面，政府、政党与各种权力机构的稳定状况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具体到政府稳定性上，就一任政府而言，“稳定”意味着它能够保持执政地位到下一届法定选举，而保持其政党构成与领导人不变；就一国政治体系而论，政府稳定性则代表在两届法定选举之间政府更迭的频度^④。这一定义尽管与传统

^①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The Definition of Stability”, <https://www.oed.com/>, 访问日期: 2022年3月5日。

^② [美] 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 储复耘译,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第155页。

^③ 杨绘荣、张静:《动态性与实践性: 政治认同与政治稳定、政治参与的逻辑联系——兼论政治认同的功能》, 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④ Florian Grotz and Till Weber, “Party Systems and Government Stabili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orld Politics*, 2012, Vol. 64, No. 4.

政治学对稳定的理解相去甚远，但简单清晰，为进一步的量化研究和回归分析提供了可能，也因此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青睐。随着学者们的不断探索，政府稳定性也发展成为以政府执政时间为核心指标，涵盖政府类型、政党成分及结束方式等多项内容的综合评价体系^①，并催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从地域来看，对政府稳定性的专门分析最早聚焦于西欧等传统民主国家。但在中东欧国家开启政治转型后，一部分学者也把目光投向这些国家，并尝试对其政府稳定性和政府更替状况进行跟踪和阐释。其中，萨默-托普库和威廉姆斯在 2008 年发表的《适者生存？中东欧国家的政府执政时间》一文被认为是首个针对中东欧国家政府稳定性的系统性研究。该文指出，相比于西欧国家，中东欧国家的政府更难持续执政到下一届议会选举^②。此后，康拉德与戈尔德对政府稳定性研究中各项指标的统计标准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和修正，并以 11 个中东欧国家从 1990 年到 2008 年的所有政府为样本，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稳定状况^③。而策尔戈夫、格罗茨与韦伯、萨维奇等人则在充分概括中东欧国家政府稳定性的基础上，对这些国家的政府稳定较低、政府更替频繁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④。

上述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也为后来的学术探索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总体而言，对中东欧国家政府稳定性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首先，从研究数量上来看，根据瓦尔特和赫尔斯特姆的统计，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只有 5 篇专门针对中东欧国家政府稳定性的研究成果^⑤。其余研究或是对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政治稳定性和民主有效性的比较分析，或是以政府稳定性为切入点的对中东欧政党体系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其次，从研究对象上来看，由于中东欧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学者使用这一概念的个人习惯，对中东欧国家政府稳定性的研究常常

① 鞠豪：《转型二十年：中东欧国家的政府稳定性》，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6 年第 2 期。

② Zeynep Somer - Topcu and Laron K. Williams,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Cabinet Duration in Post - Communist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s*, 2008, Vol. 40, No. 3.

③ Courtenay R. Conrad and Sona N. Golder, "Measuring Government Duration and Stability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an Democra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10, Vol. 49, No. 1.

④ See Eitan Tzelgov, "Communist Successor Parties and Government Survival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11, Vol. 50, No. 4; Florian Grotz and Till Weber, "Party Systems and Government Stabili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orld Politics*, 2012, Vol. 64, No. 4; Lee Savage, "Party System Polarisation and Government Dur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13, Vol. 36, No. 5.

⑤ Daniel Walther and Johan Hellstrom, "Government Termination in Europe: A Sensitivity Analysi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22, Vol. 45, No. 3.

涉及不同的国家。许多研究虽然冠以中东欧之名，但实际的研究对象并没有覆盖整个中东欧地区。转型进程相对顺利、欧洲一体化水平较高的中欧国家、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国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而西巴尔干国家的政府稳定状况往往被忽视。再次，从研究方法来看，过往的研究成果都是以数据为基础的定量分析。定量分析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数据形式直观呈现中东欧国家政府稳定性的真实状态，也能够以一种更具信服力的方式发现影响各国政府稳定性的各种因素以及不同因素的影响力大小。对于一个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的学术领域来说，这样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定量分析旨在通过变量之间的共变性来确定因果影响，而对于原因变量如何导致结果的因果机制诠释不足。因此，定量分析可以告诉我们哪些变量对中东欧各国的政府稳定性有着重要影响，但很难说明这些变量是以何种方式和过程影响政府稳定性的变化，并最终导致政府的下台和更替。最后，从研究的时间范围来看，对中东欧国家政府稳定性研究的时间范围动辄十数年，甚至二十年。对各国政府在一个自然年或是一个选举周期内的研究则十分鲜见。这一点与过往研究偏重定量分析有着密切的关系。定量分析对于变量数量与样本容量有着严格的要求。一般经验认为，样本数至少大于变量数 + 1 的 3 倍以上时，最终的结果才相对可靠。在对中东欧政府稳定性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一般会容纳 10 个甚至更多的自变量，这意味着需要研究的政府数量十分巨大。为容纳更多样本，学者们必须将研究的时间范围大幅延长，甚至覆盖从 1990 年开始的整个政治转型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这样的倾向是值得商榷的。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中东欧国家经历了若干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各个阶段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也赋予了中东欧国家不同的政治任务与挑战。比如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抗击疫情就成为中东欧各国的首要任务，疫情形势的变化也成为影响各国政府稳定性的重大因素。从这一角度出发，聚焦于一个较短时间段的政府稳定性研究可以很好地观察各国政府稳定性的阶段性变化，同时窥探特定时代背景及其相关因素对政府稳定性的影响。对比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定量分析，这样的研究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三 研究架构

在一定程度上，本文的研究架构将有别于过往的研究。首先，我们将本研究的时间范围限定为 2021 年一年。从研究方法上来说，短短一年内的政府更替情

况不足以支撑我们进行大样本的回归分析。但我们的研究兴趣也不在于此。我们希望的是以总结 2021 年中东欧国家的政府稳定状况为基础，对各种因素如何影响中东欧国家的政府稳定性进行深入的过程性分析。在分析中，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在各个案例中，中东欧国家的政府由上台执政到发生更替的真实过程，以及推动这一过程的关键性因素。在过往研究中，学者们虽然引入了不同的变量与分析方法，但对于如何解释中东欧国家的政府更替依然有着基本的共识。通常情况下，学者们会从政府自身属性（包括其组成形式、政党成分、内部权力结构等）、执政表现（包括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与惩治腐败的情况等）与政党政治环境（政治碎片化程度、意识形态极化水平等）三个维度对中东欧国家的政府更替进行诠释，其使用的自变量与控制变量也都归属于这三个维度。就执政表现来说，宏观经济表现是政府执政表现的核心内容。这是因为经济发展不仅决定着—国的发展水平，更影响到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经济指标看似宏观，却关乎居民当下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①。在民意测验中，经济问题在选民眼中的重要性也一直高于其他议题，只有在经济发展长期保持良好态势时，选民的关注焦点才会逐渐向其他议题倾斜^②。从这一角度出发，宏观经济表现是影响政府执政基础与民众支持率的重要因素，人均 GDP 水平和失业率也是学者们最常使用和解释力最为稳固的变量^③。但在 2021 年，中东欧国家深处新冠肺炎疫情的泥淖中。在这一背景下，抗击疫情、保护民众生命安全与健康成为中东欧国家的首要任务。很多情况下，社会大众的正常经济活动甚至生活娱乐都要让位于疫情防控。同时，疫情形势本身也与社会经济高度相关，一个良好的经济复苏态势和发展环境也有赖于疫情的有效控制。因此在 2021 年，抗击疫情成为中东欧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有鉴于此，我们选取疫情作为衡量政府表现的主要因素，并着重分析在疫情中各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手段及其对政府稳定执政的影响。

就政府自身属性来说，涉及执政党数量和执政党在议会席位状况的政府类型被认为是影响政府稳定性的重要因素。而联合政府是中东欧国家普遍流行的政府

① 鞠豪：《经济投票：代议制模式下的新型选举模型》，载《国外理论动态》2017 年第 8 期。

② Christopher Wlezien, “On the Saliency of Political Issues: The Problem with Most Important Problem”, *Electoral Studies*, 2005, Vol. 24, No. 4.

③ 需要说明的是，过往研究的基本解释模型与学者们经常使用的变量是笔者在对萨默-托普库和威廉姆斯、格罗茨与韦伯、瓦尔特和赫尔斯特姆等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以下两个维度的论述皆同。

类型。根据之前的统计，联合政府在中东欧各国政府中的比例超过 80%^①。从这一角度来说，探讨联合政府对中东欧国家政府稳定性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联合政府对政府稳定性的影响方式与政府执政表现是有所区别的。借助定量分析的术语，政府执政表现是独立的自变量，而联合政府则属于调节变量（mediation variable）。它虽然不能直接影响政府的稳定性与民众支持率，但会对其他自变量的影响力起到增强的作用。在本研究中，我们也假定联合政府的政府形式对中东欧国家的政府稳定性存在这一调节作用，并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其实际的作用机制与过程。

就政党政治环境来说，学者们一般认为中东欧国家的政党政治环境迥异于西欧国家。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区别是中东欧国家曾经历过一段较长的社会主义时期。而在转型后，新旧政权与制度的交替制造了不同的政党阵营（regime divide），也衍生出大量“后继党”（communist successor party）。对于这些政党来说，转型初期的政治气氛对其十分不利，“前共产党”的历史背景也往往成为其他政党攻击的标靶。即便进入政府，“后继党”也常常需要让出更多权力和部长职位，以换取其他政党的支持与合作。因此政府稳定性研究中，学者们通常将“后继党”的存在作为重要的变量，进而探究这些政党作为执政党或是反对党对政府稳定性的不同影响。在一个纵贯中东欧国家整个转型期的定量研究中，这样的考量有其合理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中东欧国家已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是否转型与应如何转型已不再是这些国家的政治主题。政治精英与社会大众也不再纯粹以意识形态审视本国的政党政治。另一方面，在过去的 30 年里，中东欧国家的政党经历了频繁的分化组合。旧政党不断消亡，新政党大量涌现。仅用“历史的标签”已无法区分当下的中东欧政党。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东欧政党政治中最重要环境因素已不再是“后继党”，而是不断壮大的民粹主义政党。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民粹主义政党就已经开始在中东欧出现，但并未成为这些国家的主流政治力量。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由于逆全球化思潮泛滥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受挫，大批民粹主义政党在中东欧国家崭露头角。而在 2021 年的各国政府中，我们也经常能看到民粹主义政党的身影。有鉴于此，我们将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视为近年来中东欧政党政治中最为重要的环境因素，并深入探究其对各国政府稳定性的影响。具体来说，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民粹主义

^① 鞠豪：《转型二十年：中东欧国家的政府稳定性》，第 22 页。

政党在进入政府后是否拥有足够的执政能力，又能否在骤然成功下保持自身的稳定，它们的这些特点对于所在政府的稳定性有什么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研究中，我们基本遵循了过往研究对于政府稳定性及相关指标的统计原则与标准。在过往研究中，任一政党退出政府即视为一任政府的结束，这与我们的一般认知——只有总理或主要执政党下台才算一任政府结束——不符。但从政府稳定性的角度出发，任意一个执政党的离开都可能导致政府内部权力结构、政府与议会关系、政府意识形态与政策倾向等属性的变化。而多个属性变化的叠加自然意味着现有的政府已不同于以往。考虑到 2021 年中东欧国家也发生了数次执政党退出政府的情况，我们继续遵循过往研究的惯例，以对这些情况进行合理的界定。

四 实证分析

（一）2021 年中东欧国家的政府稳定性情况

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2021 年不是一个选举大年，却是政治事件频发的一年。政府稳定性较低、政府更替频繁成为多数中东欧国家在 2021 年的重要政治特征。前文已述，对于政府稳定性的评估已经形成了以政府执政时间为核心指标，涵盖多种评估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因此在这一部分，我们也将结合政府更替频次、政府执政时间、政府类型与政府结束方式等相关指标对 2021 年中东欧国家的政府稳定性与政府更替情况进行详细分析。

政府更替频次：2021 年，共有 3 个中东欧国家举行了议会选举。其中，阿尔巴尼亚的执政党社会党在 2021 年 4 月的议会选举中获得大胜，得以继续执政。捷克主要执政党“不满公民行动”党（原译名 ANO2011 运动）在 10 月的大选中以微弱劣势不敌由公民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 -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以及“传统、责任、繁荣”党组成的“在一起”政党联盟。选举后，“在一起”政党联盟也与海盗党/市长联盟组成了新一届政府。保加利亚的情况相对复杂。2021 年，保加利亚共举行了三次议会选举。在前两次选举中，各大政党均组阁失败。直到第三次选举后，获胜的“我们继续变革”联盟才与其合作伙伴成功组建了新一届政府。在三次大选的间歇期内，保加利亚总统鲁门·拉德夫曾两度任命由斯特凡·亚涅夫领导的看守政府。但根据政府稳定性研究的学术惯例，看守政府

通常被认为是前任政府与后任政府之间的过渡形式，其权限与职责都十分有限，所以任命看守政府的情况不被视为一次政府更替。在本研究中，我们也遵循这一惯例，将2021年保加利亚的政府更替计为一次，而非三次。

在上述三国之外，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北马其顿则在举行国家大选的情况下发生了政府更替或重组。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和北马其顿三国因总理辞职发生政府更替；拉脱维亚是在“国家属于谁”党退出执政联盟后完成了政府重组。罗马尼亚的情况则更加复杂。2020年12月，国家自由党与拯救罗马尼亚联盟—自由统一和团结党联盟以及匈牙利族民主联盟组成了新一届政府，来自国家自由党的弗洛林·克楚出任总理。2021年9月，拯救罗马尼亚联盟—自由统一和团结党联盟宣布退出执政联盟。在更换多名部长后，由国家自由党和匈牙利族民主联盟组成的少数派政府继续执政。但仅仅一个月后，议会以多数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克楚政府被迫下台。如前所述，任一执政党脱离政府即被视为发生政府更替。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2021年罗马尼亚的政府更替计为两次。

放眼整个中东欧地区，在短短一年之内且只有三个国家举行大选的情况下，共有七个国家出现了八次政府更替。发生更替的频次和国家比例都十分惊人。其他中东欧国家虽然未在2021年发生政府更替，但其政府稳定性也难言稳固。立陶宛的政府更替发生于2020年年底，因此未被列入本研究的统计之中。但新上台的政府在执政不到一年后就陷入困境，执政党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的民众支持率仅为17%^①。而斯洛文尼亚与黑山也分别在2020年3月和12月发生了政府更替。波兰与匈牙利等国虽未发生政府更替，但其政府执政基础也分别因与欧盟的司法改革争端以及反对派的联合等因素而受到冲击。在2021年下半段，匈牙利执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与反对党联盟的支持率一直呈现互有消长的状态。而在与欧盟的矛盾达到高潮后，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的支持率在短短数月内下滑了近5%^②。上述种种情况说明，政府稳定性较低的现象并非局限于一国或一隅，而是中东欧国家的共性问题。

政府执政时间与幸存比率：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采用康拉德与戈尔德的统计标准，以全体内阁成员宣誓就职的日期作为新任政府的开始时间，而如果任一执

^① <https://www.politico.eu/europe-poll-of-polls/lithuania/>，访问日期：2022年4月3日。

^② Ibid.

政党脱离政府、总理辞职或是选举后产生新政府，则此届政府宣告正式结束。这一统计标准剔除了前任政府已然结束但新政府尚未正式成立的权力真空期。按照这一标准测算的政府执政时间要短于一般的统计方法。但是，这一标准充分考虑了新政府成立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重重考验，避免了各种极端政治状况，比如内阁职位分配的矛盾导致联合政府破裂或是政府成立却无法通过议会信任案等情况带来的干扰，因此十分贴合中东欧国家政党斗争激烈、组阁进程艰难的现状，也有利于保证研究结论的客观^①。按照这一标准，八个下台政府的平均执政时间仅有 652 天。相比于四年一次的议会选举，中东欧各国政府的执政时间显然较短，发生政府更替或重组的频度过高。当然，仅仅统计在 2021 年下台的八个政府或许存在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而由于政府更迭频繁，许多政府是在前任政府辞职后迅速上台的，它们开始执政的时间往往处在两届选举之间，而距离下届选举的时间可能只有 1~2 年。因为缺乏足够的时间展现其执政能力，这些政府常常在下届选举中败下阵来。从这一角度出发，单纯测量它们的执政时间可能并不合理。因此，为了更加准确地描述中东欧国家的政府稳定性，特别是那些中途上台的政府的生存状态，我们也引入了另外一种统计指标，即幸存比率（survived percentage）。这一指标衡量的是一任政府能否持续执政到下届法定议会选举。为契合研究主题，对于 2021 年举行选举的三个国家，我们观察的是从 2017 年到 2021 年一个完整选举周期内的历任政府。对于其他国家，我们观察的是从上上届选举到 2021 年年底的所有政府。统计结果显示，各国政府的幸存比率为 54.5%。换言之，有接近一半的政府难以持续执政到下一届议会选举。这也从另一侧面验证了中东欧国家政府稳定性较低的论断。而考虑到许多国家在现有选举周期内依然有发生政府更替的可能，未来各国政府的幸存比率将会只低不高。

政府类型与结束方式：在政府稳定性研究中，根据执政联盟内的政党数量及各政党在议会中的席位，一个政府通常被划分为五种类型：单一政党多数政府（single-party majority）；单一政党少数政府（single-party minority）；最少获胜联合政府（minimal-winning coalition）；少数派联合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多数盈余联合政府（surplus majority coalition）。具体到本研究中，在 2021 年下台的八个政府皆为联合政府。其中，多数盈余联合政府有四个，最少获胜联合政府有两个，少数派联合政府有两个。仅就这八个下台的政府来看，是否在议会中占

^① 关于这一统计标准的特点与优劣势，详见鞠豪：《转型二十年：中东欧国家的政府稳定性》，第 19 页。

据多数甚至绝对多数并不是其下台或持续执政的关键性因素，但联合政府的形式可能会伤害其稳定性。联合政府是中东欧国家十分流行的政府类型，也对这些国家的政府稳定性有着重要影响。对 2021 年中东欧国家政府稳定性的总结初步印证了这一猜想。而在下一部分，我们将深入阐释为何联合政府在中东欧国家如此盛行以及联合政府对各国政府稳定性的实际影响。

就政府结束方式而言，在法定议会选举中组建新一任政府通常被认定为是正常的政府更替。而非常规的或者说突发的政府更替通常有以下六种：总理辞职；执政党退出政府；内阁集体辞职；议会通过不信任案；总理去世；其他特殊原因。具体到中东欧国家，保加利亚与捷克的政府更替是通过议会选举完成的。其他国家的政府更替则是非常规的政府更替。爱沙尼亚的拉塔斯政府和北马其顿的扎埃夫政府是在总理辞职后宣告下台的。拉脱维亚的卡林什政府则是因执政伙伴退出执政联盟而进行了重组。罗马尼亚的克楚政府在执政伙伴退出联盟后作为少数派政府继续执政，但仅仅一个月后就因议会不信任案宣告下台。斯洛伐克的马托维奇政府是在执政伙伴退出执政联盟后陷入政治危机。仅十数天后，总理马托维奇就同意重组政府并宣布辞职。因此，我们将马托维奇政府的结束方式认定为执政党退出政府。当然，政府结束方式代表的是政府以何种方式下台，而非政府下台的真正原因。即便是以相同方式结束的政府，其下台原因也可能千差万别。因此在下一部分，我们将在已有数据和结论的基础上，发掘中东欧国家政府稳定性较低与政府更替频繁的深层次原因，并详细阐释各种关键性因素作用于中东欧国家政府稳定性，进而导致政府更替的全过程。

表 1 2021 年中东欧国家政府更替情况

国家	政府	执政时间 (天)	政府类型	政党（政党联盟） 数量	结束方式
北马其顿	扎埃夫政府	479	多数盈余联合政府	3	总理辞职
爱沙尼亚	拉塔斯政府	594	最少获胜联合政府	3	总理辞职
拉脱维亚	卡林什政府	861	多数盈余联合政府	5	执政党退出政府
保加利亚	博里索夫政府	1 431	最少获胜联合政府	2	选举产生新政府
捷克	巴比什政府	1 198	少数派联合政府	2	选举产生新政府
罗马尼亚	克楚政府 1	258	多数盈余联合政府	3	执政党退出政府
罗马尼亚	克楚政府 2	28	少数派联合政府	2	不信任案投票
斯洛伐克	马托维奇政府	368	多数盈余联合政府	4	执政党退出政府

* 本图表由作者根据相关资料绘制。

（二）政府稳定性较低与政府更替频繁的原因解析

如前所述，我们选取了新冠肺炎疫情、联合政府与民粹主义政党三个因素并尝试观察它们对中东欧国家政府稳定性和政府更替之间的实际影响力与影响机制，并通过真实的案例还原各国政府由上台执政到发生更替的完整过程。

疫情因素：从 2020 年 2 月开始，中东欧国家陆续出现了新冠肺炎感染的确诊病例。由此，抗击疫情成为中东欧国家的重要政治主题。在世界范围内，中东欧国家的医疗水平处于先进行列。但这些国家的医疗物资储备相对不足，许多医疗产品依赖进口，公共卫生开支有限，医疗人才大量流失。而在过去 30 年里，中东欧国家经历了全方位的国家转型与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相比于西欧国家，这些国家的忧患意识更强。对于可能发生的重大公共危机，无论是政府与民众都保有充分的警惕与思想准备。因此在第一波疫情中，各国政府采取了相对严厉的防控措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从 2020 年 4 月下旬开始，中东欧国家的疫情形势出现了明显的缓和。各国政府开始逐步放宽与取消疫情管控措施，并着手经济解冻工作。2020 年 5 月 14 日，斯洛文尼亚成为第一个宣布新冠肺炎疫情结束的欧洲国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新冠疫情在中东欧国家远没有结束。从 2020 年 10 月甚至是更早开始，中东欧国家陆续遭遇了数波不同程度的疫情。截至 2021 年年底，中东欧国家中感染人数最多的波兰已有累计病例 410.8 万，死亡人数 9.7 万，感染人数最少的黑山也有 17.0 万，死亡人数 2 411 人^①。

面对疫情的反复冲击，加强防护措施的开展大规模的疫苗接种成为主要应对方案，而疫苗接种更成为关键中的关键。但对于疫苗，中东欧各国国内一直存在不同意见。而是否接种疫苗不仅仅涉及科学问题，更牵扯复杂的政治账与经济账，是否接种疫苗与接种何种疫苗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在此期间，中东欧国家爆发了多场反对疫苗接种的抗议活动。抗议者以“对强制接种说不”“打倒医学专制”“维护个人自由”等口号反对政府推行的大规模接种计划。而在一段时间内，注射疫苗会产生副作用，比如“注射阿斯利康疫苗会引发血栓”等说法也甚嚣尘上。虽然各国政府都在坚定地推行大规模疫苗接种，但在各种阻力下，许多国家的疫苗接种工作依然进展缓慢。截至 2021 年年底，只有捷克、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五国的完整疫苗接种人数达到了总人口的

^① Coronavirus Global Map, Johns Hopkins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 <https://coronavirus.jhu.edu/region/montenegro>, 访问时间：2022 年 1 月 5 日。

60%，有十个国家的接种比例低于50%，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黑的接种比例甚至不足30%^①。根据罗马尼亚的官方统计，在该国的新冠死亡病例中，有92%的人没有接种新冠疫苗^②。而这也是许多中东欧国家一再遭受疫情冲击的主要原因。

除疫苗外，有效的管制措施同样可以遏制疫情。这一点在第一波疫情时已得到充分验证。但在反复变化的疫情面前，各国政府很难把握有效防控疫情和保证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严苛的管制措施或许可以有效控制疫情，但会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极大困扰。在疫情不断持续的背景下，中东欧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考虑到这一点，各国政府很难不计一切代价对管控措施进行加码。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对管控措施的接受度也在不断下降。在第一波疫情时，民众为了自身的健康与安全尚能严格地遵守防疫规定，也可以忍受短期的经济困难和生活不便。但在长期管控的背景下，民众很难一直保持平和心态，其对疫情和管控措施的态度也会发生改变。在过去的两年里，中东欧国家爆发了多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而示威游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取消限制措施，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正如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所言，“我们当然可以停掉所有一切（去抗击疫情），但这样的做法是有其代价的。同时，如果没有民众的配合，我们也无法控制疫情，只能陷入到一波又一波的反复中”^③。在很大程度上，卡拉斯的言论代表了各国政府在当前局面下的尴尬处境。

基于以上两点，只有个别政府能够在特定时段很好地应对疫情的冲击。比如在2021年上半年，阿尔巴尼亚的拉马政府采取了相对得力的防控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拉马本人亲自前往美国和土耳其商谈订购疫苗事宜，使接种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也赢得了选民的好感和信任^④，其在2021年4月的议会选举中获得大胜。但在2021年下半年，疫情形势又分别在9月和年底两度恶化，给拉马政府的执政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捷克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在2020年与疫情的

^① Coronavirus (COVID-19) Vaccinations, 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ronavirus-data>, 访问时间：2022年3月2日。

^② 《罗马尼亚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5万例》，http://m.news.cn/2021-11/06/c_1128036673.htm, 访问时间：2021年12月20日。

^③ Andrew Whyte, “Prime Minister: Lock-down came only when absolutely necessary”. <https://news.err.ee/1608138163/prime-minister-lock-down-came-only-when-absolutely-necessary>, 访问时间：2022年4月1日。

^④ 《阿尔巴尼亚执政党赢得第三个任期新政府面临多重挑战》，http://www.xinhuanet.com/2021-04/30/c_1127398712.htm, 访问时间：2021年10月9日。

斗争中，社会大众对巴比什政府反复变化的防疫政策、迟缓的信息发布与无效的沟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巴比什政府与 ANO2011 运动的民众支持率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下滑状态。但从 2021 年春季开始，捷克的疫情形势趋于稳定，疫苗接种工作也顺利开展。从 2021 年年初到 2021 年 9 月底，至少接种一针疫苗的人数由 1.2 万攀升到 610.0 万，完整接种疫苗的人数也达到了 598.2 万。因此，ANO2011 运动逐渐止住了民调下滑的颓势。在 2021 年 10 月大选前的民意调查中，ANO2011 运动获得了 25.1% 的民众支持率，在各大政党中居于首位^①。在最终的选举中，ANO2011 运动获得了 27.1% 的选票，仅以不足 0.7% 的差距落后于“在一起”政党联盟。

除上述个别情况外，大多数中东欧政府都深陷疫情的泥潭，甚至难逃下台的命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斯洛伐克的马托维奇政府。在第一波疫情中，马托维奇政府采取了相对严格的防控措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斯洛伐克也因此成为欧洲国家中的抗疫典范。此后，马托维奇政府开始分阶段地放松管控措施，解冻经济与商业娱乐活动。但在 2020 年 9 月，斯洛伐克的疫情形势又突然恶化，每日新增病例数从 9 月初的数十人迅速增长到数千人。此后半年时间里，斯洛伐克每日新增病例数一直保持在 1 千人以上，2021 年 1 月 6 日更是达到了 4 959 人的最高值，每日新增死亡人数也一直居高不下^②。前后两波疫情中的不同表现使民众对政府的不满逐渐增加。一部分民众认为，斯洛伐克政府推进的全民新冠检测并未起到应有作用，反而助长了疫情的传播，而政府采取的宵禁与封城等防疫举措看似有效，却并未被严格贯彻执行。另一部分民众则对政府相互矛盾的指令感到困惑，比如在升级防控等级的同时却尝试开放幼儿园与中小学^③。在这一背景下，马托维奇政府和普通公民组织的支持率迅速下滑。

在诸多防控措施未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马托维奇政府将希望寄托于大规模的疫苗接种。但使用何种疫苗最终成为马托维奇政府下台的导火索。在斯洛伐克，各大政党一直为疫苗的采购和使用问题，特别是为是否采用俄罗斯的疫苗而争吵。总理马托维奇和执政党普通公民组织的立场也在不断变化。2021 年年初，

^① Poll of polls: výpočet volebního modelu. <https://www.seznamzpravy.cz/clanek/pocitame-sance-kdo-vyhraje-volby-144566>, 访问时间：2021 年 10 月 9 日。

^② Coronavirus Data by Countr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SSE COVID-19 Data. <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 访问时间：2022 年 1 月 5 日。

^③ Peter Csanyi, “Slovakia’s government faces new crisis”. <https://china-cee.eu/2021/03/11/slovakia-political-briefing-slovakias-government-faces-new-crisis/>, 访问时间：2021 年 10 月 12 日。

马托维奇公开表示斯洛伐克将会获得充足的辉瑞和莫德纳疫苗。因此只有在欧盟授权批准后，斯洛伐克才会考虑来自俄罗斯的疫苗。而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马托维奇对俄罗斯疫苗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要求在斯洛伐克境内迅速推广和使用俄罗斯疫苗。马托维奇的一系列言行引发了其他执政党与反对党的不满。在中东欧地区，斯洛伐克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优等生”，也一直与欧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此，斯洛伐克的许多政党都主张在疫苗使用问题上与欧盟保持一致，即在俄罗斯疫苗获得欧盟的授权后才开始推广使用。在俄罗斯疫苗运抵科希策机场时，马托维奇亲自到场并表示感谢。但这一做法引发了其执政伙伴自由与团结党和惠民党的强烈不满。它们认为，俄罗斯的疫苗并未在欧盟登记注册，因此不能在斯洛伐克境内使用。因双方各不相让，执政联盟内部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危机，多位部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离职。最终，迫于各方的压力，马托维奇同意重组政府并宣布辞职。而马托维奇政府也成为欧洲范围内第一个直接因疫苗问题下台的政府。

联合政府：2021年，共有七个中东欧国家发生了八次政府更替。而在所有的八次政府更替中，下台的政府都是联合政府。作为一种重要的政府类型，联合政府在议会民主国家中并不罕见。然而，在中东欧国家，联合政府的数量之多、比例之高都更为惊人。对于中东欧政党来说，组建联合政府既有主动的原因，也有被动的原因。从主动方面来说，组建联合政府是为了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民众支持，进而更好实现自身目标和对选民的承诺。为此，许多政党甚至刻意弱化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不同阵营的政党合作，并甘愿承受同阵营内部的不满以及选民在选举投票中对其“背叛”的惩罚。从被动方面来说，许多中东欧国家的政党权力结构较为均衡，进入议会的政党数量较多，且议会席位相对分散。无论哪个政党在选举中获胜，都无法实现单独执政的目标。只有与一个或多个政党合作，才能确保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在许多情况下，与其他政党联合组阁是中东欧政党为了执掌政权不得不作的选择。

如前所述，联合政府对政府稳定性的影响类似于调节变量。当一任政府表现良好时，联合政府可以帮助其稳固执政基础。这是因为联合政府，特别是多数盈余联合政府往往容纳了两个或多个政党，从而有效削弱了反对派的力量。同时，多元的意识形态与政策选择也有利于吸引不同阶层与不同群体的支持。比如，拉脱维亚的卡林什政府由新团结党、新保守党、“国家属于谁”党、“为了发展”党、民族联盟共同组建而成。如此庞大的执政联盟保证了卡林什政府在议会中占

据绝对多数。而因为涵盖了七个议会政党或政党联盟中的五个，卡林什政府也有效削减了潜在的反对力量。因此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拉脱维亚虽然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行政区划改革与首都里加市议会选举等重大事件，但卡林什政府的执政地位仍相对稳固。直到“国家属于谁”党因其自身问题退出现有的执政联盟后，其余四个政党才继续组成新的执政联盟并重组政府。

而当政府表现不佳时，联合政府的脆弱性则会暴露无遗。在议会制民主政体下，社会大众会在下次选举中用投票对表现不佳的政府进行“惩罚”^①。面对一个联合政府，社会大众除了要判定整个政府的责任，也要在政府内部挑选出主要的责任承担者，或是甄别执政党各自的具体责任^②。为了躲避潜在的“惩罚”，执政党内部与执政党之间都会争功诿过，并为谁应对不佳的执政表现负责而产生激烈的争吵。由于历史因素，中东欧政党天然地衍化为不甚相容的两大阵营。在转型过程中，各种外来的和本土的政治思潮更是此起彼伏，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杂糅其间，缔造出意识形态迥异的政党。当这些政党因为暂时的共同利益而共同执政时，尚能做到基本限度的沟通与合作，即便争吵也不带有根本的原则性，而一旦国家转型或社会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执政压力陡增时，原本隐藏的分歧和矛盾把往往在具体问题上的争论演化为理论主张的对立，甚至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极易导致执政联盟破裂。

这其中，罗马尼亚克楚政府的下台过程尤为典型。上台之初，克楚政府就面临着多项挑战。严峻的新冠疫情和经济形势依然在持续，各大政党之间的角力也是暗流涌动。为解决疫情之中的经济困难，克楚政府推出了《国家复苏与韧性计划》，以向关键投资和改革提供支持。但这一计划遭到反对党社民党的强烈反对。社民党甚至向众议院提交了针对计划提出者、投资和欧盟项目部长克里斯蒂安·吉内亚的弹劾。在应对疫情方面，克楚政府一直将疫苗接种作为政府的重点工作。但出于种种原因，罗马尼亚的疫苗接种工作进展十分缓慢。截至 5 月 19 日，只有 403 万人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不到 300 万人完成了两剂接种。罗马尼亚的疫情形势也一直十分严峻。在疫情与经济形势都不乐观的情况下，执政党之间的摩擦开始增多，谁应为民众的不满负责成为执政联盟内部争执的焦点。2021 年 4 月，克楚以抗疫不力为名免去了卫生部长弗拉德·沃伊库列斯库的职务。这引发

^① Andrew Roberts, “Hyperaccountability: Economic Voting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lectoral Studies*, 2008, Vol. 27, No. 3.

^② 鞠豪:《中东欧转型中的经济投票分析》，载《俄罗斯学刊》2017 年第 5 期。

了沃伊库列斯库所在的“拯救罗马尼亚联盟”的强烈不满。“拯救罗马尼亚联盟”认定克楚是在推卸防疫责任，因此公开反对这一决定，并不再支持克楚担任总理。经过紧急磋商，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同样来自“拯救罗马尼亚联盟”的伊万娜·米赫伊勒出任部长。但此后，国家自由党与“拯救罗马尼亚联盟”又因第三阶段国家地方发展计划的内容与方案发生了分歧。急于通过这一计划的克楚再次解除了来自“拯救罗马尼亚联盟”的斯泰利安·扬的司法部长职务，导致双方矛盾再一次爆发。经过多次的冲突和摩擦后，“拯救罗马尼亚联盟”最终退出了执政联盟，并支持了社民党对克楚政府的不信任案，导致执政不到10个月的克楚政府正式下台。

放眼整个中东欧地区，在2021年的八次政府更替中，有两次直接源自于执政联盟内部的公开矛盾，一次源自于执政伙伴单方面退出联盟，一次是由于执政伙伴退出政府后同反对党一道发起议会不信任案投票。爱沙尼亚的拉塔斯政府虽因腐败问题而下台，但同样受到执政伙伴表现不佳的拖累。总体而言，中东欧政党因为自身弱势而倾向于组建联合政府，又因彼此间巨大的差异而难以保持联合政府的稳定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东欧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不成熟。

民粹主义政党：新一批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是近年来中东欧政党政治的重要特点。在近期的议会选举中，爱沙尼亚的保守人民党、罗马尼亚“拯救罗马尼亚联盟”与保加利亚的“有这样一个民族”党等民粹主义政党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对比早已在政坛站稳脚跟的主流政党，民粹主义政党大多缺乏稳定的组织结构和清晰的发展规划。在进入政府后，它们的继续发展变得困难重重。过去，中东欧民粹主义政党的“出身”和“来源”十分丰富，既有从传统政党转化来的政党，比如斯洛伐克的社会民主方向党和匈牙利的青民盟，也有许多在社会危机和民众不满中横空出世的政党，如匈牙利的尤比克党^①。而在过去的几年里，新近涌现的民粹主义政党更多是后一种类型。因为成立时间较短，这些政党尚未建立完善的组织结构，也缺乏一整套维持党内凝聚力和忠诚度的完整意识形态，其发展状况更多取决于一个或几个政党领导人。一旦党内领导层出现分歧或领导人下台离去，这些政党的生存发展就会出现問題，甚至引发一国政党政治的动荡。其次，民粹主义本身缺乏实质和核心的价值观。因此，民粹主义政党的核心内容就是“取悦于民。”只要能迎合选民的口味，“空心化”的民粹主义

^① 徐刚：《中东欧社会转型中的新民粹主义探析》，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2期。

政党会采用自由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民族主义政党乃至其他任何政党的政策。更多情况下，新一批的民粹主义政党会以一种新奇的“边际效应”来袭扰主流的政治形式，通过不落俗套的非常规性和例外性捕获民众的失望与不满情绪，以此获得民众的支持。这也是它们常常在移民、欧洲化与社会福利等问题上发出惊人之语的重要原因。在竞选过程中，这样的策略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在进入政府后，“空心化”且缺乏执政经验的民粹主义政党往往难以就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办法，也无法回应普通民众的现实诉求。而作为议会党和执政党，民粹主义政党出格的言论与行事风格也与主流的政党政治规则相抵触，导致其在执政过程中遭遇困境。

在一定程度上，拉脱维亚的“国家属于谁”党和爱沙尼亚的保守人民党分别代表了民粹主义政党在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而它们各自问题的累积也最终导致了所在政府的更替与改组。“国家属于谁”党在 2018 年首次参加议会选举就以 14.3% 的得票率成为拉脱维亚的第二大党，其总理候选人戈布泽姆斯更一度获得了组阁的授权。但在组阁选择上，“国家属于谁”党内部产生了明显的分歧。戈布泽姆斯希望建立一个由“国家属于谁”党、新保守党、绿党和农民党联盟、新团结党和民族联盟五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而凯明什则反对邀请绿党和农民党联盟加入执政联盟。双方的矛盾也由此公开化。最终，戈布泽姆斯不仅没有组阁成功，反而在卡林什政府成立后退出了“国家属于谁”党。这一事件成为该党动荡历程的开端。在很短的时间内，多名政党领导人先后离开，政党创始人阿尔图斯·凯明什也因为“背离了政党的路线”被开除出党。主要领导人的离去使得“国家属于谁”党在 2020 年的里加市议会选举中遭受重创，仅获得了 1.2% 的选票。此后，“国家属于谁”党一直处于反复改名和内部公开分裂的动荡之中。到 2021 年 6 月，该党实际控制的议会席位仅剩六席，并选择退出了执政联盟。由此，卡林什政府进行了重组，“国家属于谁”党执掌的经济部长、内政部长与福利部长三个职位则分别交由民族联盟、为了发展党和新保守党^①。但在“国家属于谁”党退出后，执政联盟在议会中的席位仅剩 48 席。作为少数派政府，改组后的政府必然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爱沙尼亚保守人民党在 2019 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 17.8% 的选票和 19 个议席，之后更受邀进入执政联盟。但在进入政府之后，保守人民党“空心化”的

^① 其中，经济部长亚尼斯·维滕博格是在任上退出“国家属于谁”党，并加入了民族联盟。

缺点暴露无遗。在内政领域，保守人民党希望建立直接民主和国家公共银行，也坚决抵制外来移民，主张保护本国文化和历史传统，并对爱沙尼亚境内的俄罗斯族人进行深刻的改造。但这些问题并非爱沙尼亚民众的首要诉求，也不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外交领域，保守人民党强烈的排外和疑欧立场使得爱沙尼亚与欧盟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更为重要的是，保守人民党的领导人马特·赫尔姆等人常常爆出出格的言论。政府组建不久，马特·赫尔姆就在公开场合表示，总统卡留莱德是一个情绪用事的女人。这一言论不仅在爱沙尼亚国内引发了轩然大波，也使得总统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陷入紧张。然而，这一事件并未让马特·赫尔姆收敛。在桑娜·马林出任芬兰总理后，马特·赫尔姆又公开表示，“我们看到了一个女售货员成为了总理”。而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公布后，马特·赫尔姆和马丁·赫尔姆等人选择为同为民粹主义领导人的特朗普站台，公开抨击新任美国总统拜登舞弊和操纵选票。保守人民党领导人的一系列言论引发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共同谴责。在巨大的压力下，马特·赫尔姆被迫辞职。事实上，保守人民党的出格言行不仅影响了自身的发展，也牵连了其执政伙伴。在与保守人民党联合执政的过程中，主要执政党中间党的民众支持率一直处于下滑的状态。而塔林港项目的腐败事件成为压垮中间党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拉塔斯政府宣告下台，保守人民党也重新沦为在野党。

上述两个事例可以代表民粹主义政党在进入政府后面临的困境及其对所在政府的影响。显然，无论是谋求自身更好的发展，还是想在中东欧政党政治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新一批的民粹主义政党仍需打磨自身的组织结构和发展规划，同时，更好地适应中东欧政党政治的规则与运作模式。仅就当下而言，民粹主义政党对于中东欧国家政府稳定性的影响仍然是挑战大于贡献。

结 论

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对人民生命安全的危害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冲击，它对各国政府稳定性的负面影响无疑是显而易见的。但因为各国政治环境与社会经济水平的差异，疫情影响各国政府稳定性的过程与方式可能略有不同。换言之，影响政府稳定性的因素通常来自政府自身属性、执政表现与政党政治环境三个维度。疫情或者说管控疫情的成效是衡量一国政府执政表现的首要因素。但其他两个维度的因素同样存在，并对疫情的影响力产生放大、干扰或者缓冲的作用。具

体到中东欧国家，联合政府的盛行与新一批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分别代表了其在政府属性与政党政治环境方面的关键性因素。它们与疫情一起共同构建了阐释中东欧国家政府稳定性状况的分析框架。仅就 2021 年来说，反复变化的疫情令各国执政党的执政基础遭受到了严重冲击，也给予了反对党和其他政治力量向其发难的机会。面对疫情的冲击，在议会民主制模式下盛行的联合政府变得非常脆弱，极易因内部冲突而发生政府更替或重组。在现有的政党政治环境中，新一批的民粹主义政党已经在中东欧国家崭露头角。但因为自身的意识形态、组织架构与行事风格等问题，它们在进入政府后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困境，对于政府稳定性的挑战也大于贡献。有鉴于此，政府稳定性较低、政府更替频繁成为中东欧国家在 2021 年的主要政治特征。

从学术探索的角度来说，本文试图将疫情这个前所未有的影响因素纳入政府稳定性的解释框架。而这一尝试可以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是验证疫情对政府稳定性的实际影响力及影响力大小；二是对疫情如何影响政府稳定性进行深入的过程性分析，还原其导致政府最终垮台的因果机制。囿于时间与精力，本文的学术努力更多侧重于第二个层面，即关注各国政府由上台执政到发生更替的真实过程以及推动这一过程的关键性因素。未来，我们也会尝试容纳更多的研究案例，并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准确测量疫情对政府稳定性的影响力，以补足在第一个层面的研究空白，并进一步验证本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责任编辑 聂侯诚)